

谨以此书献给

黔北作家书社的忠实读者们



黔北作家之友

香港文化艺术出版公司

黔北作家之友

方 竹◎主编

香港文化艺术出版公司

黔北作家之友

方 竹 主编

香港文化艺术出版公司
彩利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：850×1168 1/32 印张：3.5
2010年8月第1版2010年8月第1次印刷
国际书号：ISBN 962-201-054-8
定价：20.90元

目 录

石永言	1
宋 渤	4
司马赤	10
刘庆光	14
刘大林	18
钟永玖	20
黄先荣	25
张桂珍	31
尧玉麟	32
潘廷祥	49
方竹小语	50

唐仿萍·····	58
穆升凡·····	59
冯先政·····	61
柳 木·····	64
司马玉琴·····	65
伍小华·····	67
张 毅·····	70
刘 亚·····	74
梅 子·····	75
周山荣·····	79
方竹讲故事·····	81
我的书店，我的快乐·····	87



石永言 原名田兴詠。1938 年出生于贵州遵义老城小十字。1956 年在遵义四中求学时开始发表文学作品。1961 年毕业于贵阳师范学院（今贵州师大）。曾长期供职遵义会议纪念馆任副馆长。研究员。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获“贵州省优秀文艺家”称号。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。作品有《遵义会议纪实》、《草地惊变》、《遵义往事》、《魂断南洋》、《战争绝唱》、《贺子珍与毛泽东》等十余部，计 300 余万字。《遵义会议纪实》获贵州省二十世纪最佳文学作品之一。另有电视剧《遵义会议》，获国家“五个一”工程奖。退休后，在遵义市历史文化研究会任副会长，以研究并写作有关遵义的历史文化，自遣自娱。

文学感言：

写作，是一种寂寞的事业，必须要耐得住寂寞。所谓“板凳要坐十年冷”，即此之谓也。

写作，必须怀一颗真诚的心。必须以自己的真诚去打动读者，获得读者的共鸣。

虚假的，花里胡梢的，卖弄风骚的、或浓词艳语的文字，不是文学作品，只是一堆没有生命的文字垃圾。

生活积累之于文学创作，十分重要。古人云：读万卷书行万里路，便是最好的积累。积累愈多愈好，写作起来便得心应手，左右逢源。否则，便干枯滞涩，捉襟见肘。

真正好的作品，不是靠读了有关写作的知识方面的书而去写作出来的。没有写作方法即是最好的写作方法。这就叫创造，这才叫创作。当然，借鉴是必要的，但只能是借鉴。

脚下本没有路，通过自己去走，才走出一条路来。回首自己开创的路，才会感到欣慰。

写作，是一种心灵的诉说。必须在一种欲诉之而后快的心情支配下去写作，才会有好的结果，不然，则是作秀。

王国维论词的高下，分三种境界。第一种是：“昨夜西

风凋碧树，独上高楼，望尽天涯路。”第二种是：“衣带渐宽终不悔，为伊销得人憔悴。”第三种是“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。”统观文学创作，概莫如此。



黔北作家书社刚成立不久，国防大学将校师生进书店买书并与方竹合影。

追忆与感言

宋 渤

阅读成为我的基本生活方式。并非为佐证鲁迅所言无聊才读书，是习惯。正读着电话响起，黔北作家书社掌门人方竹电告，适逢书社八年社庆，她打算做件好事，出本书宣传黔北各位作家，嘱我写点感言参与。

曾想婉辞：我本散淡之人，怕热闹，更怕炒作。转念一想不妥，方竹乃侠义之人，这位苗家少女走出务川闯进遵义，以“让苍天知道我不服输”的精神，从摆地摊出售自家作品起步，历尽几多风雨，而今打拼成书社经理政协委员知名女作家，实属不易。更为难得是她怀着感恩的心，念念不忘造福乡梓，自己掏钱为乡亲父老出书，热情宣传深山里的小村庄，此举感人至深。如今她又出资宣传黔北作家，对此壮举焉有不捧场之理？赶忙俯案疾书，写下追忆写下感言，为书社，也为自己。

之一

先要说明：宋渤系笔名，原名宋立福。祖籍山东蓬莱



(从未去过)，生于辽宁新金（现已撤消）。两地隔渤海而相眺，故取名为渤，数典而不忘祖之谓也。

这就生出一个疑问：你厮本是北方人氏，怎会混进“黔北作家”之列，有本土户口吗？实不相瞒，此事与伟大领袖毛泽东有关。在拙作《车坠安江》中已作交待：“一九六五年公司领导动员职工扔下家庭去支援三线建设，说三线不建好毛主席睡不着觉。他老人家说，没有公路拿他的稿费修，没有铁路他骑毛驴去。我们一听就急了，毛主席睡不

着觉是我们失职啊！请他老人家放心吧，大三线我们去建，没有路我们去修。毛主席挣几个稿费也不容易，请他老人家留着买烟抽吧，不要拿出来修路了；他老人家烟瘾大，没钱买烟怎么行，总不能让他老人家满大街拾烟头吧！告别老婆，离开孩子，我们争到第一批奔赴大三线，别人坐车尾，我们坐车头，敢争天下先。”

于是乎，就来到遵义，一晃将近五十年，弹指一挥间。献了青春献终身，献了终身献子孙。北方人视我为遵义人，遵义人视我为北方人，究竟是哪里人，管他的，反正当今哪里都是人。

之二

高智商的作家大多是无师自通。我不行，我是被人带上文学这条路的。

辽宁有个腾鳌镇，镇上有文化站，站长名叫金燕，是位能力超群工作出色的美男子（当时没有帅哥这个称谓），把全镇的群众文化搞得有声有色红红火火。他还是位远近闻名的才子小说家。我几次请教他如何写小说，他总是用审视的目光打量我一笑了之。1955年春上某日，金站长让我陪他去理发，回来路上问我对理发店老板有何看法？我说，此人善变，对理发的老农他冷得像块冰，见到

你他变成一团火，对我他是半冷半热阴阳脸，典型的市侩。金站长听罢大笑说，你不是问我怎么写小说么，把理发的故事写下来就是小说；懂得观察生活的人已经够半个作家。就这样，我被收进由他创办的文学创作组，第二年在鞍山文艺发表诗作，从此熟人戏称我是小作家。

我一直把金燕看作恩师，是他带着我踏上文学创作之路。1956年我外出读书跟他断了联系，5年后惊悉他被关进大牢。原来，1958年补充反右，上头下达一名“补充右派”指标，身为作家的金燕被选中。入狱后他想不通，急火攻心，两耳致聋，落下终身残疾。

1982年残冬我返乡时专程去看他。一别26载，相见时分外激动。他抓住我的手几度泣不成声，连呼，宋老弟我冤枉啊冤枉啊！我选择最动听的话语劝慰，他怔怔地瞅着我毫无反应。我猛然想起他已失聪什么也听不到，我扑上前去抱住他，大恸。当年那位俊男不见了，眼前的恩师形容枯槁，眼神迷茫，背驼腰弯，气喘吁吁。将好端端一个人整成这样，这是理应受到诅咒的卑劣行为！

满怀同情，我特地为恩师写下散文《小镇才子也坎坷》，登在遵义晚报上，但未寄给他，怕勾起往事触痛伤痕。1991年我将出版的首部长篇小说《坎坷人生路》寄去，他回信说收到后一口气看完，兴奋得夜不成眠，当年的创作

组没有白办，欣慰至极。

后来的日子里，我发表过上百篇散文小说报告文学，多次获得奖项，都未敢告诉恩师，怕他笑我王婆卖瓜，自卖自夸。直到我陆续发表长篇小说《疑案与人生》、《我歌我泣》、《三界人生》、《车坠安江》（其中三部入藏中国现代文学馆），200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。我想，该向恩师汇报了。孰料，一声霹雳在头顶炸响，恩师金燕已撒手人寰，驾鹤西归。追忆他的坎坷经历，我不知该作何语？斯人已逝，情何以堪；天公不公，枉为天公！

之三

苦苦思索过一个既简单又不简单的命题：作家是干什么的？

我曾是个理想主义者，很幼稚很天真稍带有些愤青情结的那类。所以我一直认为，作家理应是铁肩担道义，妙手著文章的历史记录者，像司马迁鲁迅那种，作家应是《旧约》里讲的“守望者”，目光犀利能看到社会的凶兆，负责指出大至一国小自一人的罪错，以未来的险恶发出警告，促进当下的觉醒和改过革新（这种人是一个时代的心灵与目光）；作家应是经济学之父亚当·斯密在《道德情操论》中提出的“公正的旁观者”，他应极富同情心，喜别人所喜，

忧别人所忧，将全部的爱奉献给人间；一句话，作家是社会的良心，他的天职是扬善抑恶，主持正义，为普天下无权无钱的弱势群体鼓与呼。

我深信不疑，我的恩师金燕会是这样的作家。可惜，他死了！

2010年4月20日于遵义刘家湾



黔北作家书社刚创办那年，接受《贵州日报》金艾记者（右）的采访。方竹（左）。

文学之惑

司马赤



梁文珊，1942年生，遵义人。常被人将名字写为“梁文姗”，至今“须眉”变“娥眉”也！甚至还有人写信称“姗妹”，大有“执之之手，与子偕老”之意，令人啼笑不得，故用“司马赤”为笔名，少许多麻烦。慎重声明：本人汉族，男性，纯爷们，如假包换。

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，写散文一篇被《大公报》发表，兴致勃勃正想继续，“文化大革命”震动全国，忙不迭将稿笺纸换成打字纸，黑钢笔换为羊毫笔，蝇头小楷换为行书大字，全身心投入捍卫路线和革命斗争的行动中，这一

“捍卫”就是十年。到1977年，报纸又有了副刊，文学杂志又渐次恢复，不免技痒，又学着写了些散文、小说给报刊，均被采纳，好生欢喜。缘于此，被调到县文化馆，有更多的时间写作。1983年，中篇小说《仇家父子》在省里获奖，写得更有兴致，却又被调到原遵义市（现红花岗区）文联做《遵义文学》编辑。《遵义文学》是月刊，我编小说，每期要审读数百万字的稿纸，再编选出近二十万字的作品入刊，还要跑印刷，校对。如此下来，自己写东西是不用想了。不写就不写，反正都是工作。编了几年刊物，正编得有兴趣，领导上又令我专门做文学组织工作，自此，红花岗作家协会主席一直做到2002年退休。

以上便是我人生中有关文学的几十年经历。自我审视，在文学圈子几十年，我只能算个杂工，一个“过得去”的杂工：编写小说，集书两本《日遇三险》和《回头一笑》，过得去；论编辑，有约数百万字的书（《群星璀璨》、《名城儿女抗洪记》、《寸心集》……等）和刊物，过得去；做作协工作，有历年的总结及褒奖在，过得去。总而言之，过得去，如此而已。

遵义有个“黔北作家书社”，书店有个经理叫方竹，方竹忽生创意，要对遵义的文学工作来一次检阅——说检阅大了，检索吧，调查吧，令我写经历，发感言，交照片，照片和经历好办，有旧抄，再抄一遍就是，感言却颇费踌躇，

一者本人患脑梗塞，语言和思维有障碍，二者本人虽然混迹文坛多年，到底文学是什么东西都弄不清楚，怎么“感”？如何“言”？思之良久，只得强词几句。

听人说过，文学是伟大的事业，古云“文治武功”，“文以载道”赞不绝口，虽然以“文”所指乃国家大事，社稷大器，包罗万象，意义恢宏，但文学终究是其中一项，那么，说它是“事业”总不为过吧？

窃以为非也，不尽然也！自当今上溯至三皇五帝，文学之著作者，或穷困，或潦倒，或衣不蔽体，或食不果腹，或家破、或人亡者无计其数，噫！如文学真是事业，也太不眷顾它的创造者了。在生活无保障，生命不安全的境况下，还谈什么事业！

当然，凡事都有例外。历朝历代，也有人因文学而飞黄腾达，养尊处优。远例不举，就说“文化大革命”时期，知识分子（自然包括作家）通通被打为“臭老九”，沦为社会另类，在秋风肃杀中颤栗，在秋雨寒夜中哀叹的同时，不就有那么几个“革命”的作家、政治家、理论家在“四人帮”的保护下，宠信下，组成“写作班子”为主子摇旗呐喊，作威作福吗？

然则这只是个案，个案不代表全体。故此，对大多数文学创作者而言，有位哲人就发自肺腑的喟叹道：文学其实是使人受苦受难的！